

周恩来与 1973 年 11 月基辛格访华^{*}

陈 兼

(华东师范大学冷战国际史研究中心, 上海, 200241; 康奈尔大学, 美国)

摘 要: 1973 年基辛格访华时, 他在与周恩来的会谈中提出了中美军事情报合作问题, 其中的关键是在中美之间建立一条秘密热线, 如苏联发动对中国的核打击, 美方可及时向中方提供预警。对于基辛格提出的这一建议, 双方虽有讨论, 但中方并未接受。此后, 这却成为周恩来受到批判的一个缘由。关于这个问题, 一些研究这段中美关系和周恩来生平的论著虽有提及, 但大都语焉不详。但这件事涉及中美之间“心照不宣的同盟”(基辛格语)和“文化大革命”后期中国的国内政治, 对于周恩来研究来说也是一个需要厘清的问题。

关键词: 周恩来; 基辛格访华; 中美关系

在周恩来的政治和外交生涯中, 1973 年 11 月基辛格访华只是一个片断——尽管是一个极为重要的片断。若就访问的效果而言, 它加强了中美之间“心照不宣的同盟关系(tacit alliance)”,^①并起到了改善当时仍然处于“文革”时期的中国的国际环境的作用。本来, 这应当被视为周恩来在外交上的又一成功事例。然而, 基辛格离开中国后, 中共上层却发生了一场被江青称之为“第十一次路线斗争”的“批周风波”。据称, 周恩来和基辛格会谈中涉及中美军事合作以及美国“向中国提供核保护伞”的问题, 而周恩来却“处理不当”。从 11 月下旬到 12 月上旬, 中共中央政治局根据毛泽东的指示连续举行会议, 周恩来在会上被扣上了“卖国”和“右倾投降主义”的大帽子, 成为众人批判的“靶子”。但正当周恩来的政治生命似乎已达到岌岌可危的地步时, 事情又发生了峰回路转的变化, 就在当时刚刚复出的邓小平在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后, 毛泽东表示“总理还是总理”, 政治局“批周”也戛然而止。但“反周”的暗流并未消失。随着“批林批孔”运动的掀起, 矛头或明或暗地指向周恩来的“批周公”论调肆虐。周恩来当时已身患绝症。某种意义上说, 他生命的最后几年, 是在同 1973 年“批周风波”相关的巨大阴影中度过的。

1973 年的这场“批周风波”何以会发生? 这里, 有着同毛泽东的“暮年焦虑”和“文革”后期中国各种力量复杂交错的政治情势有关的一系列深层次原因。^②但其直接的触发因素, 却无疑是 1973 年 11 月基辛格访华期间同周恩来的会谈。因此, 要搞清楚事情的来龙去脉, 当然需要探究周恩来和基辛格究竟谈了及做了些什么(或没有做些什么), 以及这同“批周”风波究竟有什么关系。

这就涉及资料的发掘和使用问题。在中国方面, 关于 1973 年 11 月基辛格访华的档案资料还没有解密, 更勿论此后政治局会议的记录了(此类材料, 至今尚无解密公布及供学者研究的先例)。在由中央文献研究室撰写的《周恩来传》和《周恩来年谱》等关于周恩来生平的权威著作中, 对于这件事语焉

^{*} 本文原系作者向 2013 年 10 月 21—23 日在南开大学举行的“第四届周恩来国际学术讨论会”提交的论文。笔者谨在此向徐行教授及会议组织委员会邀请笔者与会表示感谢。

^① 这是基辛格在尼克松访华后关于中美关系的说法。参见 Kissinger to Nixon, “My Trip to Peking, June 19-23, 1972,” Box 851, NSF, NPM, p. 2.

^② 关于这一题目, 一些学者已做过很好的研究, 如杨奎松《中美和解过程中的中方变奏》, 载杨奎松《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史研究》2, 南昌: 江西人民出版社, 2009 年, 第 296—319 页, 其中第 309—313 页讨论了“批周”事件的缘起, 并提出了一些极有见地的看法; 陈东林《周恩来最艰难的时刻——1973 年“批周”风波考述》, 载徐行主编《二十一世纪周恩来研究的新视野》,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8 年, 第 731—743 页。笔者从中获益匪浅。

不详。其他相关论述,则往往有着以讹传讹、相互矛盾乃至失实之处。

在美国方面,关于这次访问的档案文献也出现了罕见的复杂情况。乍一看来,美方的相关文件似乎均已解密,相当一部分还收入了《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FRUS)。^①然而,其中没有包括基辛格和周恩来会谈中涉及中美秘密军事情报合作的关键性文件。作为美方主要当事人的基辛格本人,在上世纪80年代初和90年代末先后出版了《动乱年代》和《复兴年代》的回忆录;2011年,又发表了将中美关系研究和他本人作为亲历者的回忆浑为一体的《论中国》一书。^②他在这三本书中都提到了1973年11月访华以及同周恩来会谈的情况,在《论中国》一书中,还讨论了周恩来此后受到批判的问题。然而,他却并没有提到自己曾同周恩来讨论中美军事情报合作这件事。他已先后将自己的全部文件交给美国国会图书馆和耶鲁大学收存并供研究者使用,但其中没有他同周恩来讨论中美军事情报合作的几个关键性文件。

上世纪90年代后期,设于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的非官方学术机构“国家安全档案馆”(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③根据美国《信息自由法》,提出了解密基辛格档案文件的要求。在这一过程中,出于“偶然的机遇”(这是著名学者、《基辛格密档》编者William Burr的说法),长期担任基辛格助手的洛德的一部分卷宗解密开放,其中居然有几份周恩来—基辛格讨论中国军事合作的文件。然而,这些文件在解密过程中都经过了“净化”处理。从现存于国家安全档案馆的文件复印件以及FRUS的个别文件中,虽然可以窥知周恩来和基辛格讨论这一问题的若干重要片断和细节,却并不足以掌握讨论的前因后果和全貌。

笔者在长期从事中美关系史(尤其是冷战时期中美外交谈判历史),以及周恩来政治和外交生涯研究的过程中,一直希望对这一重要事件做较为深入的探讨。笔者尝试写出此文,主要通过对照审读美方的解密文件以及中方的相关资料,并参照笔者2012年3月在耶鲁大学召开的“基辛格档案文献会议”上与基辛格本人就此事的对话,提出自己的看法及一些目前尚难解答的疑问,以期抛砖引玉,就这一重要史事做一些新探索。

基辛格1973年11月访华的背景

1973年11月基辛格访华时何以会涉及中美军事情报合作问题?此后,“批周”风波又何以会发生?这里,有着大背景上的三方面因素。一是中美关系面临着双边关系“解冻”后如何克服台湾问题等障碍进一步前行的挑战;二是美国国内尼克松总统面临着如何处置逐渐陷入“水门事件”泥淖的挑战;三是中国国内面临着如何应对林彪事件后的复杂局面的挑战。

尼克松于1972年2月访华后,中美关系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双方都希望如同尼克松曾表示过的那样,在他的第二任期内实现两国建交。1973年初,尼克松已再次当选总统,美国通过“巴黎协定”的达成,也已从越南战争“脱身”。中美外交关系实现正常化,应当提上日程了。但如何处理台湾问题从一开始就是两国关系进一步前行的主要障碍乃至“瓶颈”。基辛格1973年2月访华时,因而提出了中美关系正常化分两步走,先在各自首都建立联络处,然后再在尼克松第二任期内“按照日本方式”建交的提议,得到了中方的赞同。^④

中美关系“解冻”,也加强了美国在同苏联打交道时的地位,美苏之间的“缓和”进程获得突破性进展。1972年5月,尼克松访问苏联,美苏两国领导人签订了限制战略核武器的协定。这一重大发展,对中美两国领导人都提出了如何在美、苏、中“三角”关系中各自定位对方并界定中美双边关系的地位和

^① 参见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69—1976, volume XVIII, China, 1973—1976* (Washington, DC: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2007), pp. 326-443.

^② Henry Kissinger, *Years of Upheaval* (New York: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1982); Henry Kissinger, *Years of Renewal: The Concluding Volume of His Memoirs*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99); Henry Kissinger, *On China* (New York: Penguin Books, 2011).

^③ 美国国家安全档案馆是民间学术研究机构,和美国政府和国家档案馆等没有组织上的联系。其主要宗旨,则是根据美国《信息自由法》(Freedom of Information Act)及其他途径,通过推动档案文献的解密开放来促进学术研究的发展。

^④ FRUS, 1969—1976, XVIII, esp. pp. 81-82.

作用的新挑战。

上述过程,又由于渗入了美国国内政治的因素而更加复杂化。早在尼克松竞选连任总统时,“水门事件”便已露出端倪。进入1973年以后,更是出现了越演越烈的趋势,尼克松也日益卷入“水门事件”的政治漩涡。在此情况下,一方面,尼克松处理诸如中美关系正常化之类的重大问题的能力(尤其是处理台湾问题的能力),受到了严重的影响,很难无所顾忌地动用自己在国内政治中的各种“资本”为中美关系更上一层楼清扫障碍;但另一方面,他又希望能够通过在国际事务中的某些成就和“突破”(在必要时则诉诸秘密外交的途径),转移人们对国内政治问题的注意力,并减轻自己在国内受到的政治压力。

基辛格1973年11月访华,又是在中国国内政治局势经历了复杂变化的情况下发生的。1971年9月林彪事件发生后,“文革”日益走下坡路,毛泽东“继续革命”的正当性与合法性陷入前所未有的危机。此时,毛泽东本人的健康状况也急剧衰退,甚至在尼克松访华前发生了休克及呼吸近乎停止的险象。这一切结合在一起,使得毛泽东产生了挥之不去的“暮年焦虑”。他知道,自己离“去见马克思”的时刻越来越近了。他最为看重的“文革”已经搞不下去,但如何收场,又会给中国留下怎样的遗产以及被后人如何评价,却是他无力控制的。对他来说,安排“身后之事”是一个极为迫切的问题,但在处理上,他却踌躇再三,难以做出决断。他觉得周恩来在大政方针上常有“右”的表现,因而从来没有把周当作理想的接班人。但林彪事件后,周恩来在不经意间便坐上了中国的“第二把交椅”;中美关系“解冻”后,更是声名远扬,在党内的权力和影响力大大上升,以致达到“功高盖主”的地步。这就更加深了从未将周恩来视为理想的“接班人”的毛泽东在身后安排问题上的焦虑。他晚年对周恩来不断“敲打”和批判的原因,由此可见端倪。

同时,中美关系“解冻”,也意味着中国内外国策的基本改变。无论是出于重建“新中国”合法性叙述的需要,还是为了提出一种既与这种需要相契合又能让中国应对国际挑战的关于世界格局的新框架,毛泽东都有必要在理论上对美国在世界上的“定位”及其与中国的关系做出新的诠释。在这一过程中,正如杨奎松所指出:毛泽东的思路和表述在既要坚持“革命”理念又要顾及对美和解的现实之间来回摇摆,处于某种纠结状态。^①在这一背景下,毛泽东自1973年起,在不同场合提出并阐述他的“三个世界”理论,对世界格局做出了“超越冷战”的新界定。但毛泽东的新表述在现实政策制定和实行中的涵义,却是需要别人(包括周恩来在内)不断体察和领会的,并非一下子就能抓住其“要害”和“实质”——即便对于同毛泽东共事已达半个世纪之久的周恩来,恐怕也是如此。

1973年2月17日,毛泽东会见基辛格时提出了以“遏制苏联”“一条线”的想法“要搞一条横线,美国、日本、巴基斯坦、伊朗(毛主席猛烈咳嗽)、土耳其、以及欧洲。”^②这是他的一个“大看法”。但在具体政策制定、表述和实施的层面,这又意味着什么?这是周恩来作为“实际做事的人”必须知道的,但看来他一开始对此并不清楚。后来,这成为他被“敲打”批判的一个“导火索”。

1973年6月,外交部内部刊物《新情况》刊登了《对尼克松—勃列日涅夫会谈的初步看法》的文章,认为美苏会谈“欺骗性更大”,“美苏主宰世界的气氛更浓”。周恩来读后批示“《新情况》这篇文章写得不错”,提出的问题“值得研究”。^③然而,毛泽东读后却表示,简报存在着严重问题。周恩来得知毛的批评后,立即命令撤回简报,并承担道“这个错误主要责任在我”。^④但毛却抓住这件事情不放。7月4日,他约见张春桥、王洪文时再次批评153期《新情况》对世界形势的看法“近来外交部有若干问题不大令人满意,我常吹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而外交部忽然来一个什么大欺骗、大主宰。在

① 杨奎松《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史研究》2,第311—313页。

②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between Mao Zedong and Kissinger, February 17—18, 1973, 11:30 p. m. —1:20 a. m., FRUS, 1969—1976, vol. XVIII, p. 131. 中方会谈记录中,这段话稍有不同,毛说“要搞一条横线,就是纬度,美国、日本、中国、巴基斯坦、伊朗、土耳其、欧洲。”

③ 宗道一:《周恩来与外交部“153(新情况)事件”》,载《文史精华》2000年第7期。

④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603页。

思想方法上是看表面,不看实质。”这是针对简报的。但随后他话锋一转,隐然以周恩来为目标,讲了几句很重的话:“结论是四句话: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此调不改动,势必搞修正。将来搞修正主义,莫说我事先没讲。”张春桥随后通知周恩来,要求中央政治局开会传达讨论毛泽东的谈话。^①第二天,周恩来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由张春桥转述毛泽东的批评。周恩来也详细叙述了毛泽东自6月下旬以来对外交部的批评和批示,并在会上作检讨。同日,他又给毛泽东写信,再作检讨。7月12日,他再次召集外交部有关负责人开会,讨论起草批评并纠正153期《新情况》的文章。之后,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继续讨论此事,并将经自己亲自修改的《“新情况”153号错误何在?》一文送交毛。他按照毛泽东批评简报的调子表示:“(美苏)争夺是长期目的,是实质,勾结是表面现象,互相利用为自己利益服务,而且勾结是为了更大的争夺。同时,也会从反面教育更多的人民觉悟起来,反对两霸。”当天,毛泽东批示道“检讨不要写了”。^②但后来的事态发展表明,这件事情并未结束。

中国国内高层政治的上述发展,以及周恩来受到毛泽东批评等情况,虽然并不为美方所知晓,但具体掌控处理同中国关系的基辛格以及尼克松总统本人,仍然感觉到了中美关系中存在着一种“奇怪的气氛”。^③这是我们理解1973年11月基辛格访华背景时要考虑的另一因素。

基辛格同毛泽东和周恩来的会谈

1973年11月10日—14日,基辛格以美国国务卿兼总统安全事务助理的身份访问中国。这是他自1971年7月首次访华后第六次访华,也是他出任国务卿后首次访华。作为亚洲之行的一部分,中国是他的最后一站,但显然是最为重要的一站。他在包括日本的其他国家都只停留了半天左右时间,唯独在中国停留了4天,由此可见他对于此次访华的高度重视。^④

11月10日,基辛格到达北京。此后4天里,他同周恩来共举行了5次正式会谈,涉及了双边关系和亚太地区及全球局势有关的一系列问题,并“在所有问题上都取得了积极的成果”。^⑤

这里还需要强调的一点是,以往人们对基辛格此次访华的关注几乎都集中在“高层政治”以及重大外交战略问题上,尤其是集中在“中美军事合作”以及此后的“批周”风波上。这些问题当然是极其重要的,需要深入探讨,而学界在这上面还有很多工作要做(本文也是属于这方面努力的一部分)。然而,基辛格1973年11月访华其实还涉及了外交、军事和战略领域以外的一系列重要及影响深远的问题。其中,尤为重要的是在中美之间——从更为广泛的意义上来说,则是在中国和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及其主导的“世界市场”之间——发展经济和贸易关系的讨论。这同当时中国已经开始投入实行的“四三计划”形成交叉和呼应,对改变中国的“国际定位”(由现存国际体系和体制的“挑战者”和“局外人”开始向“局内人”转变)和进一步改变“文革”期间中国在国际上陷入孤立的局面,都具有极为深远的意义。我们甚至可以说,这在实际上构成了毛泽东逝世后中国改革开放历史进程起步的一个重要前奏。这一切,是我们在讨论基辛格访华的影响以及周恩来在其中的作用时,不能予以忽视的。

11月12日,毛泽东会见了基辛格,从下午5时40分到8时25分,历时长达2小时45分钟。这是毛同美国人会见中从未有过的记录。中方参加会谈的有总理周恩来,外交部长姬鹏飞,外交部部长助理王海容,以及担任翻译的唐闻生;美方参加会谈的有驻华联络处主任布鲁斯,国务院计划协调主任、长期担任基辛格助理的洛德。

毛泽东与基辛格的谈话在轻松的气氛中进行,内容极为广泛,其中相当一部分,是毛泽东向基辛格阐述自己的“一条线、一大片”的想法,并引伸开去,讨论了遏制苏联扩张的问题。会谈中也涉及了台湾

①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第604页。

③ 这是2012年3月基辛格在耶鲁大学举行的“基辛格档案会议”上的话。

④ 笔者曾在一系列研究中一再强调,冷战最后20年间,在美国冷战全球战略和亚洲—太平洋政策中,中美之间“心照不宣的同盟”的重要性远远超过了美日同盟的重要性。

⑤ 这是基辛格访问后给尼克松报告中的话。FRUS, 1969—1976, vol. XVIII, p. 431。

问题,“水门事件”,中东局势,甚至讲起了“外交哲学问题”等等。^①谈话的一个“花絮”是,毛泽东讲到“水门事件”时,甚为不屑,表示搞不懂美国人为什么居然会抓住这么一件“屁事”大做文章。结果,为了翻译“屁事”这个词,唐闻生还做了一大段解释。^②

根据美方记录,基辛格没有直接提到中美军事情报合作的问题,其中与此最为接近的一段对话如下:

基辛格:我们总是把我们同苏联打交道中做的每件事都告诉你们。我们同苏联的交道中,没有什么你们不知道的东西,你们可以指望将来也会如此。苏联希望造成一种印象,他们和我们有一个主宰世界的大计划,但那是给别的国家设下的陷阱。那是没有的事。我们没有那么愚蠢。

毛泽东:……你们跟我们的看法差不多,就是苏联有可能要打中国。

基辛格:嗯,主席先生,我原来认为,这只有理论上的可能性。现在我认为,有更大的现实可能性,这个话我讲过,尤其是对你们的总理和大使讲过。我认为,说到底,他们是要摧毁你们的核能力。

毛泽东:但是我们的核能力比一个苍蝇也大不了多少(笑)。

……

基辛格:嗯,正如我多次讲过的,上次也向主席讲过,我们认为,如果这种事情还是发生了,这会对我们所有人都产生严重后果,所以我们决心要反对。这是我们自己的决定,同中国没有这方面的安排。^③

此后,谈话转向其他问题。基辛格没有当面向毛泽东提出中美军事合作之事。一种可能是,在他看来,像这样的“具体问题”,尽管极为重要,也是应该同周恩来讨论的。然而,他和毛泽东的上述对话,很可能使他认为,他已在毛泽东那里为关于中美军事情报合作的讨论“挂了号”。^④

周恩来和基辛格关于“中美军事合作”的特别会谈

综合目前可以看到的中美两方面的相关文献资料,基辛格访华期间,同周恩来就“中美军事合作”问题共有过三次特别会谈。第一次,是在基辛格到达北京的当晚便举行的,这种安排本身就表明了双方对于此事的重视。中方除周恩来外,参加者还有叶剑英元帅、乔冠华副外长、以及担任翻译的唐闻生;美方参加者只有基辛格和洛德。^⑤基辛格开门见山就提到,苏联曾几次提出要与美国交换关于中国的战略情报,但为美方拒绝。接着他谈到,美国“不是出于无私,而是出于自己的利益考虑”,要阻止苏联对中国的“大规模进攻”。基辛格谈到,通过同苏联领导人的会谈,他相信苏联对中国持有“普遍的敌意”。接着,他说了下面这段话:

现在,作为这些谈话的结果,我已指示,在我们政府内做一些只有四五个人才知情的研究,以便搞清楚我们对这种威胁到底知道多少;从我们的知识出发,可以做些什么来阻止它;以及我们可以用何种不让人看出来的方法来(向中国)提供帮助——这是因为,我不认为我们双方的任何一方希望发展一种正式的关系。这些应该是技术性质的。我现在没有带这些文件,它们在宾馆里。对

^①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Mao Zedong with Kissinger, November 12, 1973, 5:50—8:25 p. m., *FRUS*, 1969—1976, vol. XVI-II, pp. 380-400.

^② *FRUS*, 1969—1976, XVIII, pp. 382-383.

^③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Mao Zedong with Kissinger, November 12, 1973, 5:40—8:25 p. m., *FRUS*, 1969—1976, XVIII, p. 384. 值得注意的是,基辛格上述最后一句话“这是我们自己的决定,同中国没有这方面的安排”,同中方记录有出入。中方的记录是“所以我们决心加以反对。我们已经决定不允许中国的安全遭到破坏。”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传(1949—1976)》(下)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1669页。

^④ 在耶鲁的“基辛格档案会议”上,基辛格虽然回避他1973年11月访华期间关于中美军事合作的讨论,但在谈到他与毛泽东的会见时,他几次强调,当时谈得“非常好”,觉得中美之间“什么事都可以谈”,甚至“都可以做”(笔者记录)。

^⑤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Zhou Enlai with Kissinger, November 10, 1973, 9:25—10:00 p. m., *FRUS*, 1969—1976, XVIII, pp. 326-331.

于如何改进你们力量的弱势地位,以及如何延长预警时间,我们有些想法。我再重复一遍,做这件事时,要非常秘密,让人看不出来。如果总理有兴趣,我可以让豪尔司令(Commander Jonathan T. Howe)——在某些方面,我本人也可以——在一个小范围内向总理本人和他指定的助手谈一谈细节。这件事,不涉及回报或正式关系,而只是根据我们的经验和一些经过整理的情报资料,而为我们提供的意见。

从后来的情况看,这就是基辛格关于“中美军事合作”的提议。根据美方记录,周恩来没有接着基辛格的话茬谈下去,而是把话题岔开了。以周恩来的阅历,他肯定知道,基辛格提出的问题极为重要,显然属于毛泽东所说的“大事”。那他为什么没有马上对此作出回应?笔者认为,除了他感到有必要先此做深入考虑外,还应该是因为他尚未就这么一件大事向毛泽东汇报,并获得毛的指示。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到,周恩来在处理这件“大事”时,从一开始就是十分谨慎的。

关于中共领导层究竟如何讨论此事,以及周恩来是否或如何向毛泽东报告此事,目前还没有看到任何相关材料。但笔者认为,无论从道理上和周恩来一贯的处事风格来看,都难以想像他在会后不会向毛泽东报告,或中共领导层会不对此进行讨论(至少,参加了这次特别会谈的周恩来和叶剑英应该也会在会后商讨此事)。笔者因而认为,我们在研究1973年11月基辛格访华期间双方关于“中美军事合作”的会谈以及政治局的“批周”风波(包括在探究周恩来是否向毛泽东报告过此事)的时候,不能仅仅把眼睛盯在本文以下将要述及的11月14日凌晨这段时间上,也应注意探讨并搞清周恩来是否在11月10日的会议后已经向毛泽东报告并讨论过此事。

第二次会议——也是三次会议中最关键的一次——在11月13日夜举行,基辛格提出了向中国提供尖端军事情报及相关技术帮助的具体建议。据美方文件记载,中方参加者除周恩来外,还有军委副主席叶剑英、担任翻译的唐闻生,担任军事术语翻译的杨玉蓉(Yang Yu-yung,女,名字系音译)。美方参加者,除基辛格本人外,还有驻华大使布鲁斯,国家安全委员会成员豪尔司令,和担任速记的哈尔女士。^①

从美方解密的会谈部分记录来看,双方在会谈开始时,循着基辛格和毛泽东谈话时的相关话头,讨论了中苏之间一旦发生战争时如何进行合作的问题。基辛格说“现在我们可以从两方面提供帮助。第一,如果战争明显地延长,我们可以通过提供装备和其他服务来给予帮助。但我今天要谈的是我们能做些什么,以缩短(中国)处于弱势地位(vulnerability)的时间。”他接着说:

缩短弱势地位时间的一种途径,是抓住任何国家在考虑自卫时都绝不能忽略的一些问题。任何一个国家都会碰到的问题,是早期预警。如果是轰炸机,就是要建立不会遭到渗透的空防体系。如果是导弹,就是在导弹发射时获得确切的警报。

接着,基辛格强调了严格保密的重要性“现在,我们基于我们双方的共同利益而向你们提供的任何帮助,其方式必须不会轻易地便被探知。”之后,他和周恩来之间有以下对话:

基辛格:关于导弹发射,我们有一种很好的卫星系统,可以为我们提供预警。问题在于,如何将这一信息迅速地传递给你们。我们准备在我们的卫星和北京之间建立一条热线,通过它,我们可以在几分钟内就将信息传递给你们。

周恩来:通过卫星?

基辛格:嗯,信息先传递到华盛顿,再传递到北京。我们有一二个办法,以便在这么做时不引起别人注意。我们可以宣布,建立一条像我们同莫斯科、日本等已经有的那种热线。但是你们的这条是特殊的,但这一点一般不会为人所知。如果你们知道袭击正在到来,这将使你们转移你们的轰炸机,如果可能的话,也转移你们的导弹。为此,你们需要在北京和你们的各基地之间有好的

^① Memorandum, Zhou Enlai with Kissinger, November 13, 1973, 10:00 p. m—12:30 a. m., 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

通讯设施。另一种方法,是像我们同苏联所做的那样,在我们之间签订一项关于意外发生的核战争的协定,并建立热线。简单来说,我想的是有什么办法,能够建立一条到北京的热线,而不会引起别人注意。

美方解密文件的以下部分被“净化”处理。所以,我们不知道基辛格和周恩来接下来是否或如何对此做了进一步讨论,以及基辛格是否做了进一步的解释。美方解密文件只记载了周恩来对基辛格说的下面这段话:

关于你希望讨论的这个特殊问题,我必须对之进行研究。明天早上你走之前,我会来看你并道别。我认为,这里有些东西对我们是有用的。在战争中,人的因素固然是决定性的,但实际的(东西)也是作数的。^①

从周恩来回答的语气来看,他没有拒绝基辛格的提议。这是否是因为他前一天参加了毛泽东和基辛格的谈话、并听到基辛格说“我们已经决定不允许中国的安全遭到破坏”,而毛泽东并未对此提出反驳?这是否又是因为他和基辛格11月10日第一次讨论军事合作问题后,已向毛作过汇报,或中共领导层已有过相关讨论?这是否还因为毛泽东提出“一条线、一大片”后、尤其是在批评153号《新情况》通报时,一再强调美苏之间的矛盾和争夺以及利用这种矛盾的重要性,由此而对周恩来应对基辛格提议时的态度产生的影响?这些问题,是需要进一步探究的。

尽管周恩来已答应基辛格,要立即对他的建议进行研究,并在第二天早上基辛格离开北京前给他一个答复,但这次会后,周恩来并没有马上离开,而是几乎马不停蹄地又和基辛格继续开会,对基辛格访华公报的内容和文字作最后审定,直到11月14日凌晨2时20分才结束。^②第二天清晨7时35分起,两人又根据约定,再次见面。这期间,只有5个小时多一点的时间,周恩来做了些什么?

一种相当流行的说法是,在这之后,周恩来立即赶到了毛泽东的住处,准备向毛泽东汇报,但不巧的是,当时毛吃过安眠药后已经睡下了,周恩来便没有打搅他,因而也就没有得到当面向毛泽东汇报的机会。《晚年周恩来》一书中,说周恩来尽管“急得团团转”,但为了不打搅毛睡觉,还是自己“拍板做了决定”。书中还引用了周恩来《工作日志》,说周在凌晨这段时间里“莫名其妙地审查起毛泽东会见基辛格的电视记录片来”。^③

然而,作为“半个当事人”的章含之对此有另一种说法。据她回忆,周恩来和基辛格的会谈结束后,“老乔(乔冠华)就走上去问总理是否有事情交办。总理说现在太急了,基辛格的问题要马上答复,要报告主席。……总理说完和唐闻生急急忙忙走了。”第二天早晨,周恩来告诉乔冠华“基辛格提出来中美之间进行正式的军事合作,美方用他们先进的卫星技术监视苏联在远东地区的军事活动;中美相互交换军事情报。当时,总理告诉老乔,说毛主席同意了,现在就答复基辛格。”^④这就是说,在11月14日清晨的这几个小时里,周恩来向毛泽东做了汇报并获得了毛泽东的指示。笔者认为,若以周恩来的性格、一贯谨慎的行事作风、以及中国国内当时的政治形势(尤其是毛泽东对周恩来“大事不讨论”的批评)为标杆,这一说法似乎更符合逻辑。

关于周恩来向毛泽东做过汇报,《晚年周恩来》一书也“阴差阳错”地提供了另一旁证。书中,在论证周恩来当晚未打搅毛泽东而自行“拍板”做了决定时,引用了作家权延赤在《走下圣坛的周恩来》中记述的周身边卫士的证言。然而,该书却把事情搞反了。书中的引文是“因为事情很急,不能等。最后,周恩来下决心承担责任,拍板做了决定。”然而,权书的原文却是“因为事情很急,不能等。最后,总

① Memorandum, Zhou Enlai with Kissinger, November 13, 1973, 10:00 p. m—12:30 a. m., 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

② Memorandum, Zhou Enlai with Kissinger, November 14, 1973, 1:00 —2:20 a. m., NSC Files, Kissinger Files, Country Files—Far East, Box 100, Nixon Library.

③ 高文谦《晚年周恩来》,香港:明镜出版社2003年,第462页。

④ 《章含之同志谈话》,1998年4月3日打印件,第1—2页。

理下决心承担责任,叫醒毛泽东作决定。”^①如果权书所记述的周恩来卫士的回忆是可靠的,那么,这段引文恰恰印证了章含之的说法,即周向毛做了汇报。

第三次特别会谈是在11月14日早上举行的。关于这次会谈,美方文件中有同一时间(7时35分—8时25分)的两份文件(或一个文件分成了被区别对待的两个部分)。其中一份已经完全解密并收入了《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周恩来和基辛格讨论的主题是日本问题。^②

另一份则记录了周恩来和基辛格关于军事合作问题的最后一次谈话,但又经过了大段“净化”处理,解密的只是片断。中方参加者是周恩来和担任翻译的唐闻生;美方参加者是基辛格,豪尔司令,以及担任速记的安德鲁女士。从文件的解密部分来看,双方的讨论涉及了相互关联的两部分内容。

第一部分的讨论集中于中国所受到的苏联威胁。从文件解密内容看,周恩来在强调苏联的威胁后说“只有这样来看问题,我们才能不断提醒自己,不能丧失警惕。沿海地区也是如此,因为他们肯定会从侧翼过来。由于他们以前就来过这里,他们对中国的沿海地区更熟悉。因此,我们必须设想,有一个时期我们只能孤军作战,这就是(我们)基本的军事概念。过去,我们说过同时四面受敌的问题。现在我们不这么说了。”基辛格立即表示“你们不必浪费资源来防备我们。”这一部分的谈话,应是为以下“具体的”讨论的一种铺垫。

会谈的第二部分,是周恩来对基辛格在先前会议中所提建议的答复和讨论。美方文件关于双方对话的记载如下:

周恩来:我们现在不谈细节,但我们提出了这样一个建议。在这些情况下,如果像你们设想的那样,你们可以在提供预警上同我们合作,这在情报上是很大的帮助。当然,还有通讯系统问题。但这样做时不能让别人觉得我们是盟友。

基辛格:我同意。

周恩来:因此,这确实需要很好的磋商。公报中关于磋商用了“具体的”这个词,用得很对。

基辛格:总理先生,我们绝对没有办法秘密地建立一条热线。

周恩来:是的,我理解。

基辛格:但一旦这条线建立起来,我们可以让它像你昨天所说的那样派用场,同时对此保密。

周恩来:因为这是一个十分具体和复杂的问题,我们在同你们进一步协商前需要对它进行研究。从事这种协商的一个级别,可以像昨天的文件(指联合公报)说的那样,是“具有权威的级别”。这是你们提议的,我们认为可以用。在将要发表的公报中,我们在不代表第三方的情况下,进行具体磋商。现在你是国务卿了,也许你会发现没有以前那么多的时间了。但我们很欣赏这一事实,你在其他国家都只待半天,而在这里却待了四天。在旋风般地访问其他国家后,你在这里待了四天。这样做的结果是我们今天早上在这里会面。所以,除了你亲自来以外,我们会通过联络处进行联系。就是这里的布鲁斯大使和那里的黄镇大使。这件事,只能通过他和一个翻译来做。他将知道(这件事),因为他是一个军人,懂得打仗。在这一意义上,他不会用抽象的方式说话,也不会仅仅躺在大原则上。我们这一边,参与者只有我本人,叶剑英元帅,和你那天碰到的蔡洪京(Cai Hongjing,此处系音译)副部长。当然,当我们涉及工作的细节时,我们可能需要增加一些人。在你们这方面,已经包括了国防部长,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和他的助手。

基辛格:但你们的大使只应该同我联系。因为那些知道这件事的人,并不知道我对你说了些什么。还有,坦率地说——这你能理解——我只会在我们决定走出一步时,才把这一步告诉我的同事们,不会多说一句。这样做,泄密的危险会减少到最小的程度。

^① 权延赤《走下圣坛的周恩来》,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第351页

^②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Zhou Enlai with Kissinger, November 14, 1973, 7:25—8:25 a. m., *FRUS*, 1969—1976, XVIII, pp. 427-430.

周恩来：是的。因为我们知道你能够保密，但你这么做时一定要非常严格。

基辛格：是的。

周恩来：在我们这一方面，当然，主要的人是我本人和叶剑英元帅，以及我们的助手。即便在决定要由我们这一方做出时，每件事也要通过这个渠道来办。

基辛格：我们相信，你们知道怎样保密。

周恩来：因为这些秘密和其他问题上的有些不同，必须根据情况来对待。还有，当需要使用无线电通讯时，可以有各种方式。因为现在无线电通讯并非仅仅局限于一种方式，而是有各种方式，通讯的内容是可以被人破译的。我想，这是我现在要说的一切。至于下一步，当我们考虑好这件事以后，我们会让黄镇大使同你联系。也许他在这期间必须回来，这样我们可以讨论这件事。^①

由于文件本身不完整，上述有些话（如周恩来开头时说“我们提出了这样一个建议”）的意思便不甚清楚，不知究竟指的是什么建议。但总的来看，有三点似乎是明确的：第一，周恩来对于基辛格几个小时前提出的建议持欢迎态度，并表示，这对中国“是很大的帮助”。第二，他没有当即接受基辛格的提议，而是表示要对“这个十分具体和复杂的问题”进行研究，然后再通过“具有权威的级别”进一步商讨。第三，双方都提出，要对此事高度保密，只让极少数几个人参与，并由周恩来和基辛格直接掌控。

以下，美方文件又有一大段经“净化”处理后删去。接下来，周恩来和基辛格转入在中美间建立“热线”及时否为此签订协定的讨论。基辛格为此准备了两份不同的协定草案。一份是关于“建立供两国政府首脑在紧急情况下使用的直接通讯线路”，另一份，是关于在两国间建立“热线”，以防止“在意外或未经授权的情况下使用两国所持有的核武器”，以及“万一发生此种意外时，双方立即作出一切努力并采取必要措施，以避免造成危害”。^②基辛格向周恩来解释道，这同美国1972年同苏联签订的条约相似。他表示，这个条约本身并不重要，“我们只是需要有一个借口，来签定建立热线的协定。苏联没法反对这件事，因为他们也和我们签订了同样的条约。”基辛格把两个协定草案都留给了周恩来，并表示：“你们可以两个都要，也可以把它们分开。”他还说：“我们也准备在没有条约的情况下直接就建立热线。我们的想法是，把热线在我们这一端同卫星联系起来，然后同你们一起，解决怎样才能把这个情报迅速和直接地送给你们。”

对此，周恩来明确回答：“我们必须对这个问题进行研究，因为，考虑到我们国家的性质，如果我们采取这样一种行动的话，会在国际上产生巨大的影响。他们知道我们不说空话。……如果不太方便的话，这件事可以等。”^③

然而，尽管周恩来和基辛格商定双方将继续就此事联络商讨，但在这次会议之后，中国方面再无人向美方提起此事。这件事，也就不了了之了。^④

政治局“批周”

基辛格走后，北京出了大事。根据《周恩来年谱》等记载，毛泽东在听了唐闻生和王海容的“不可靠”汇报后，认定周恩来在与基辛格会谈中“说了错话”。^⑤11月17日，他与周恩来和外交部负责人及其他有关人员开会时，针对周恩来和基辛格的会谈，说了这么一段话：不要受美国人的骗。美国人向中国捞稻草，救它的命。对美国要注意，搞斗争的时候容易“左”，搞联合的时候容易右。我看基本上一切不要，所谓基本上，就是不跟他搞什么军事同盟那一套。现在做生意买得也太多，我是点了头的，罪魁

^{①②}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Zhou Enlai with Kissinger, November 14, 1973, 7:25—8:25 a.m., Kissinger files, 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

^③ 在中共关于这次会谈记录中，周恩来告诉基辛格“我们还要考虑”，“要报告毛主席，一切由毛主席决定”。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传（1949—1976）》（下），第1669页，其出处为“周恩来同基辛格第三次单独会谈记录，1973年11月14日”。

^④ 基辛格在耶鲁的会议上说：“我知道北京出事了，但我不知道出了什么事。我在北京时，同毛泽东和周恩来谈得很好，但回来后，就没有下文了。”

^⑤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第634页。

祸首是我。这回勾结美国,罪魁祸首又是我。^①毛泽东要求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他的意见。

对毛泽东的话如何看?尤其是“现在做生意买得也太多,我是点了头的,罪魁祸首是我。这回勾结美国,罪魁祸首又是我。”这段话如何解读?毛泽东在这里说“我是点了头的”时的“自我批评”,是关于他主张同美国人搞“一条线”的泛指?还是关于基辛格此次访华涉及“军事合作”问题的特指?值得注意的是,他没有说周这次是“大事”不报告。这是否意味着,周其实是向毛报告过的,只是在执行中对毛的指示领会错了,犯了毛所说的“搞联合的时候容易右”的错误?

但在一个问题上,毛泽东做了结论,那就是,对于美国的军事帮助,“基本上一切不要”。这就给“中美军事合作”关上了大门。

对于毛泽东的指示,周恩来不敢怠慢,当晚便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传达毛泽东的意见,并介绍了自己同基辛格会谈的情况。江青在会上发难,指责周恩来回避实质,是“右倾投降主义”。周恩来一反常态,“起而与之争辩”。次日,周恩来两次向毛泽东书面报告政治局会议的情况。值得注意的是,他只是表示自己在此次中美会谈中“做得不够”。^②

从11月21日起,中共中央政治局根据毛泽东的指示连续开会,展开对周恩来上纲上线的全面批判。关于会议的过程,包括《周恩来传》和《周恩来年谱》在内的权威著作都只有短短几句话的叙述。在笔者所看到的材料中,最详尽的,是章含之1998年的口述史回忆资料。同时,《晚年周恩来》一书中,也对此有较为详细的讨论。笔者以下关于会议的叙述,是综合目前可以看到的各种材料,予以“重建”的。

会议开始后,先由王海容介绍了中美会谈的情况。然后,带着“尚方宝剑”而来的唐闻生在会上做了长达两个多小时的发言。^③在这之后,政治局委员们便开始轮番向周恩来开炮,指责他在同基辛格的会谈中“丧权辱国”,走了“右倾投降主义”的路。江青等更进一步上纲上线,把周恩来的问题上升为“第十一次路线斗争”,说他是“错误路线的头子”。

对于周恩来来说,这一切既是“无中生有”,又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词”。自延安整风起,周恩来在遇到此类批判时,一般采取委屈求全地“全盘接受”并作自我批评的应对之道(他当年面对毛泽东对“反冒进”的严厉批评时,就是这么做的)。然而,这一次面对强加于他的“丧权辱国”的指责,周恩来却一反以往,不肯按照这个调子作自我批判,而只是反复强调“我不是投降派”。结果,与会者只能不断重复关于周是“投降主义”的指责,会议竟然到了几乎开不下去的地步。后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会议扩大并转移到人民大会堂福建厅举行,包括章含之在内的一批非政治局成员也列席会议,以增强对周恩来的批判“火力”。

邓小平当时刚刚复出,他也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列席了会议,但一直只听不说。就在会议陷入僵局时,他发言了。本来,毛泽东让邓小平出席这次“批周”会议,就带有借此观察他的立场和态度的意图。邓小平“曾经沧海难为水”,不会看不到这一点。他一直不发言,其实也是在观察情况,寻找发言的契机,既不能将周打倒在地,又要在毛那里交代过去。结果,邓小平开始“批周”时,在本来就是“批周”导火索的国际问题上,只是泛泛地讲了一通大道理,只字不提“丧权辱国”的“滔天罪名”,而是说了意思大致如下的一番话:我们都说要向毛主席学习,但我们都知道,我们是可望而不可及;恩来同志,你也说要向毛主席学习,但你心里却以为,你是可望亦可及的。这就是你的问题症结之所在。

邓小平的发言,被《晚年周恩来》一书称之为“诛心之论”。^④该书在资料上用了不少功夫,有其学术上的一定价值。但在这一点上,恐怕有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之处。邓的讲话中,透露出的其实是一种

① 《毛泽东同周恩来谈话记录》,1973年11月17日。转引自李捷《从解冻到建交:中国政治变动与中美关系》,宫力等编《从解冻到建交:中美关系正常化进程再探讨(1969—1979)》,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274页。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第634页。

③ 高文谦《晚年周恩来》一书中,则说唐做了8个多小时的发言,但未指明出处何在。

④ 高文谦《晚年周恩来》,第469页。

极高的政治智慧。邓小平在会上说周恩来对毛有着“可望亦可及”的心理,从表面上看,这似乎是一个极为严重的问题,既抓住了毛泽东“暮年焦虑”的要害,但又不至于置周于死地。归根结底,谁都想到,毛泽东百年之后,周恩来若还活着的话自然便有着“取而代之”的可能性,这并不一定是非份之想,从道理上来说,也是为党章和党内实践所允许的。在邓小平发言后,江青等人拼命将“迫不及待”地想要“取而代之”的帽子扣到周恩来头上,意思是周恩来要在毛泽东还健在时便准备“抢班夺权”,但这并不是邓小平的本意,也绝不为周恩来所接受。后来,就连毛泽东本人也对此予以否定。

然而,“丧权辱国”的罪名就不同了。在爱国主义和革命民族主义早已成为中共及其国家合法性叙述的根基之所在的背景下,谁要是被认为从事了“丧权辱国”的勾当,那就只有落得像林彪那样死无葬身之地的下场了。周恩来对于这里的分寸和区别是十分清楚的。更何况,在这样“兴师动众”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周恩来不做“深刻检讨”是过不了关的。而在“卖国”及“右倾投降”和“取而代之”之间,周恩来必须择其一。相形之下,后者与前者性质是不同的。

邓小平发言后,周恩来于12月4日作了一个“上纲很高”的检讨。^①而当毛泽东得到唐、王两人关于邓小平发言的报告后,也显得极为满意,表示“我早就知道他发言的”,并称赞邓小平在政治上就是比江青等人要技高一筹。毛泽东兴起之下,甚至要马上把邓小平找来,只是因为已届深夜,又一时没有邓小平的地址,才没有这么做。^②

表面上看,随着周恩来在政治局会议上“缴械”,他似乎已经处于被“打倒”的边缘了。可是,就在这个当口,风向转了,毛泽东显然认为,“批周”之举已经达到了“狠狠敲打”周的目的。12月9日,毛泽东会见尼泊尔国王比兰德拉和王后,周恩来也出场作陪。据会见记录记载,毛泽东在见到周恩来时,同他“长时间热烈握手”,然后,又指着一同参加会见的唐闻生、王海容等对周恩来说:“总理啊!现在的小将不好惹呢。把他们提起来,整了你,也整了我。”^③几句话里,毛泽东不仅表达了前一阵政治局如此“整周”并非他的初衷这一层意思,也在实际上为“批周”踩了刹车。

会见后,毛泽东又同周恩来和王洪文等谈话,开宗明义,便为持续了十多天的“批周”会议定调子。他一方面说“这次会议开得很好”(也就是说,“批周”这件事的大方向还是对的,没有搞错);但另一方面,他又说“有人讲错了两句话,一个是讲‘十一次路线斗争’不应该那么讲,实际上也不是;一个是讲总理‘迫不及待’,总理不是迫不及待,她(指江青)自己才是迫不及待。”^④这几句话,似乎一下子便将周恩来的问题归结为“人民内部矛盾”,使得周恩来得以被解脱了出来。

但实际上,事情并没有就此结束。12月12日,毛泽东亲自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又批评“政治局不议政”、“军委不议军”,^⑤周恩来还是批评之所向。此后,批林批孔运动兴起时,又处处夹杂着“批周公”的杂音,周恩来仍然是矛头之所指。直到1974年底,毛泽东在一次同邓小平的谈话中,在谈到周恩来和基辛格1973年11月的会谈时,又翻出这个旧账说:就是保护伞,借一个保护伞给我们。^⑥这就是说,某种意义上这件事还“搁”在那里,在“必要时”,这个“旧账”是可以重新被翻出来的。这是不是毛泽东为“身后”政治布局下的又一步棋?

几点看法

本文所叙述的,是一个“重大事件”,也是一个仍存在诸多疑点和空白点的事件。以下所记,并非“结论”,而是一些还有待于在进一步的史料发掘的基础上予以发展乃至修正的看法。

基辛格1973年11月访华期间,确实同周恩来讨论了中美之间秘密军事情报合作的问题。通过在

① 高文谦《晚年周恩来》,第474页。

② 毛毛《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287—289页。

③④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传(1949—1976)》(下),第1671页。

⑤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第636页。

⑥ 《毛泽东同邓小平谈话记录》,1974年11月28日,转移自李捷《从解冻到建交:中国政治变动与中美关系》,第274页。

中美之间建立以公开热线为掩护的特殊热线,如果出现苏联向中国发射导弹的情况,美国将用自己的卫星探测新技术迅速将信息传递到中国,并帮助中国在北京和战略基地间建立联络,防备苏联导弹。严格来说,这不是美国为中国提供“核保护”。从美方文件看,双方会谈中没有涉及美国向中国提供“核保护伞”的问题。周恩来对基辛格的建议表示欢迎,但同时还表示,要对此作进一步研究,再在“具有权威的级别”同美方后续联络商讨此事。由于毛泽东的否决,此事未进行下去。

就其基本原因而言,这件事之所以发生,并不是周恩来在同基辛格会谈中说了什么“错话”或做了什么错事,而是本文行文中论及的毛泽东的事关身后安排的“暮年焦虑”。所谓周恩来在同基辛格会谈时犯了“右倾投降主义”的错误,只是用来“批周”的一个由头。这里,我们必须直面毛泽东晚年和周恩来之间的复杂关系。我认为,邓榕(毛毛)在这上面的看法是很有道理的“毛泽东对于周恩来,既离不开,又总不满意,实质是觉得周的思想跟他不相容,太‘右’。他要批周,却绝不会打倒周。”^①

关于这件事,中美都留下了一些目前还难以澄清的疑点。中国一方,最大的问题就是周恩来是否向毛泽东作过报告并得到了毛的指示。在能够直接说明这个问题的档案文献解密以前,笔者倾向于认为,周恩来是向毛泽东汇报过此事的。说到底,以周恩来的谨慎性格和政治敏感,又在那种本来就已经是“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情况下,完全不能想像,在这样一件大事上,他会擅自行事。如果说,11月14日凌晨他到毛泽东住所时,由于毛已经入睡而无法当面汇报,也很难设想,他会不留下任何交待便径自离去。而何况,从11月14日基辛格离京到11月17日毛泽东见周恩来并指示政治局开会讨论此事,其间还有三天时间,难道他在这几天里还会不向毛泽东报告此事?再联想到周恩来在政治局会议上拒绝承认犯下了“丧权辱国”的错误,更说明他认为自己在这件事情上——正如他11月17日给毛泽东的报告中所言——至多是“做得不够”。^②

美方的一个大疑点是,笔者遍查了国家档案馆、尼克松图书馆、国家安全档案馆以及弗吉尼亚大学米勒中心总统录音项目的相关材料,却找不到任何基辛格访华前曾就此事向尼克松总统请示的材料;同时,在他访问结束后给尼克松总统的报告中,对访问的过程及各次会谈的情况均作了详细概述,唯独完全没有提及同周恩来就秘密热线问题的会谈的情况,更没有提及周恩来对此的反应及双方关于后续步骤的约定。^③同时,在美方目前解密的相关文件中,也看不到基辛格就此事采取后续行动的任何材料。基辛格本人对此事也一直是讳莫如深。如前所述,在他的回忆录和新近出版的《论中国》一书中,对于当年他和周恩来这方面的讨论完全没有提及。2012年3月底,耶鲁大学为基辛格将自己全部文件捐赠该校,举行了一次学术讨论会。笔者亦应邀参加会议,并在一个长达两小时的“专题对话”中,获得了和基辛格当面切磋此事的机会。然而,基辛格一再强调,他和周恩来所谈的与美苏之间要建立的热线没有什么区别,“只是我口袋里的一个小土豆”。笔者向洛德提到此事时,他表示,已经完全记不清这件事情了。显然,即便在美国最高决策层,此事亦属于最高层级的机密,并制作了保密层级及解密要求和程序不同的两组文件。今后,即便美方文件进一步解密后,仍需要中方解密文件及当事人回忆的对照印证,^④以及历史学者的批判性研究,才能构成一种较为完整的叙事。

(责任编辑 孔令琴)

① 毛毛《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第289页。

② 笔者的另一个相关问题是,周恩来以往在同美方打交道时,对涉及中国主权的问题始终保持着高度警觉。例如,尼克松访华前,美方先遣队同中方讨论卫星终端站租用等问题时,周恩来首先考虑的,是这同中国主权的的关系。而当黑格在访问期间提到美国关注中国的“生存权力”时,周恩来又立即提出反驳。为什么——至少从现有文件来看是如此——当基辛格一再提到中国的“弱势地位”时,却未见周恩来提出反驳?这是否是他在此事上向毛做过汇报、而毛又有指示的又一线索?

③ Memorandum from Kissinger to Nixon, November 19, 1973, *FRUS*, 1973—1976, XVIII, pp. 430-441.

④ 现在,当事人中依然还健在的,中方有唐闻生和王海容,美方则有基辛格和洛德等。唐、王两人是此事的亲历者,对此当然最有发言权。

Abstracts and Keywords of Major Articles

Facing a Historical Opportunity: The Sino-U. S. Rapprochement and the Sino-North Korean Relations (1971—1974) (by SHEN Zhi-hua)

Abstract: To extricate themselves from diplomatic predicaments ,both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needed a rapprochement in their relations. At the same time ,such a rapprochement offered a historical opportunity for the peaceful resolution of the Korean issue. In its diplomatic negotiations with the United States ,the Chinese government paid special attention to the interests and demands of North Korea and promised to assist Pyongyang in achieving peaceful unification. With China's diplomatic negotiations with the United States and efforts at the UN ,the UN Commission for the Unification and Rehabilitation of Korea was disbanded in November 1973. In this process ,North Korea adopted more radical and uncompromising measures ,which were in contrast to China's tactics. Primarily due to the escalated tension between South and North Korea ,the issue of the withdrawal of U. S. army from South Korea remained unresolved. Thanks to the Sino-U. S. rapprochement ,the international status and security environment of North Korea was greatly improved. During this period ,China and North Korea maintained and developed friendly relations. Generally speaking ,China made a great effort to help North Korea ,while North Korea depended too much on China.

Keywords: Sino-U. S. relations ,Sino-North Korean relations ,the Korean issue at the UN

Zhou Enlai and Kissinger's Visit to China in November 1973 (by CHEN Jian)

Abstract: By comparing declassified American documents with available Chinese materials ,as well as referring to the author's dialogue with Dr. Kissinger himself at the "Kissinger documentary conference" at Yale University in March 2012 ,this paper tries to have some fresh exploration of Kissinger's visit to China in November 1973 ,Zhou's discussion with him about Chinese-American military-intelligence cooperation and ,in relation with them ,the Politburo's criticism of Zhou after Kissinger's visit.

Keywords: Zhou Enlai ,Kissinger's visit to China ,Sino-U. S. relations

China's Traditional Technical Cognition: Its Features and Today's Values (by LI Quan-min)

Abstract: China's traditional techniques are based on natural cognition. In the technical activities in ancient China ,valuating and cognizing are interlocked ,and embodied knowing and tacit knowledge are developed. These features of cognition ,together with specific forms of China's traditional society ,bring about the prosperity of practical techniques which are closely related to people's livelihood on the one hand ,and cause the contempt for or rejection of seemingly useless "bizarre techniques and skills" and inhibit the development of a theoretical tradition on the other. Nevertheless ,under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technological revolution ,the cognitive features of China's traditional techniques and their related concepts are worth reconsidering.

Keywords: technique ,cognition ,tradition ,China

Causal or Logical Relation between Intention and Action?: On von Wright's Theory of Logical Connection Argument (by ZHANG Su-zhen)

Abstract: Is the relation between intention and action logical or causal? This is the most heated controversy between intentionalism and causalism. Logical connection argument (LCA) is proposed by early inten-